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佛教甘肃卷八

信仰与敦煌(弥勒变)的起源	王德芬(1)
时期过甘肃石窟寺概述	董玉琳(25)
敦煌中的《天请问经变相》	李川(44)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	王惠文(50)
甘谷大梁山石窟	李业武(62)
大佛寺有关问题考述	陈林斗(63)
佛寺院经济的运行及其思考	曹金才(75)
一世与拉卜楞寺	马秉(82)
佛教文学汉化倾向考	任廷(86)
莫高窟第271窟北壁故事画的佛经依据	赵睿(93)
词研究综述	卢秀武(108)
本《修心要论》各议	李尚(112)
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	孔(118)
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	方广(124)
壁画中的摩崖经变	陈清(138)
敦煌古抄佛说观经以后	陈清(156)
本《大乘布萨文》研究	肖云(173)
敦煌文书《佛藏经》的藏语译本	林(189)
文殊山石窟寺的兴建	刘(205)
本《六祖坛经》读后管见	潘(221)
河西藏族与佛教	曹永(李(240)
《佛经》(劝善经)《众生》	董(255)
佛教文化与体育	李(韩(262)
藏系统与实践	孔(271)
大世达赖喇嘛	董(279)
天水市发现唐	沙(286)
写本《水月观音》	王(296)
在敦煌僧俗中的流传	关(297)
藏文《俱舍论》反译者考述	王(310)
担任大法台传承纪略	党(高(341)
甘肃佛教寺院述略	丁(丁(354)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弥勒信仰与敦煌《弥勒变》的起源	王静芬(1)
北魏时期的甘肃石窟寺概述	董玉祥(25)
敦煌壁画中的《天请问经变相》	李刘(44)
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	王惠民(50)
甘肃甘谷大象山石窟	李亚太(62)
张掖大佛寺有关问题考述	尹清亮 杜斗城(67)
拉卜楞寺院经济的运行及其思考	东嘎仓·才让加(75)
嘉木样一世与拉卜楞寺	马秉勋(82)
敦煌佛教文学儒化倾向考	汪泛舟(86)
试论莫高窟第 275 窟北壁故事画的佛经依据	赵秀荣(93)
刘萨诃研究综述	卢秀文(108)
敦煌本《修心要论》刍议	李尚全(112)
试述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	扎扎(118)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	方广锜(124)
敦煌壁画中的维摩经变	陈清香(135)
看了敦煌古抄佛说观经以后	陈祚龙(156)
敦煌本《大乘布萨文》研究	冉云华(173)
从敦煌文书看佛教徒的造经祈福	林聪明(190)
酒泉文殊山石窟寺的兴衰	刘兴义(208)
敦煌本《六祖坛经》读后管见	潘重规(221)
宋代河西藏族与佛教	(日)岩崎力著 秦永章 李丽译校(240)
《新菩萨经》《劝善经》《救诸众生苦难经》校录及其流传背景之探讨	圆空(255)
敦煌佛教文化与体育	李重申 韩佐生(267)
嘉木样系统与班禅系统关系考略	扎扎(271)
对第六世达赖喇嘛赏给黑错寺执照的考释	曲又新(279)
甘肃天水市发现唐代永安寺舍利塔地宫	莎柳(286)
敦煌写本《水月观音经》研究	王惠民(290)
论禅宗在敦煌僧俗中的流传	姜伯勤(297)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译者考述	王克(310)
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三世佛与三佛造像的诸问题(一)	贺世哲(321)
卓尼大寺历任大法台传承纪略	觉乃·洛桑丹珠(341)
临潭藏传佛教寺院述略	丁谦 丁志胜(354)

活佛转世传承的文化内涵	巴桑罗布(361)
敦煌本乘恩帖考证	姜伯勤(370)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本价值试论	王三庆(383)
拉卜楞寺著名蒙古族高僧传略	丹曲(405)
敦煌泗洲僧伽经象与泗洲和尚信仰	罗世平(409)
敦煌本《历代法宝记》与蜀地禅宗	杜斗城(414)
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世系述略	扎扎(425)
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的诸问题(二)	贺世哲(434)
敦煌地藏图像和“地藏十王厅”研究	罗华庆(444)
敦煌《密严经变》考释	王惠民(454)
奚康生与南、北石窟寺	木十戊(465)
《大乘二十二问》之研究	巴宙(470)



弥勒信仰与敦煌《弥勒变》的起源

王静芬

弥勒信仰首先在印度北部形成，流行于大小乘，经南北两路传出，在中国约 4 世纪至 10 世纪流行，影响远及韩国、日本。在敦煌石窟壁画所见约 20 种经变题材中，《弥勒变》是流行的经变之一，由隋至宋，现存共约 90 铺，仅次于《西方净土变》及《药师变》。本文试就佛教经籍史料及早期佛教美术资料等来探讨早期弥勒信仰的形态、在中国的发展和《弥勒变》的形成年代及源流。

一、弥勒经籍及弥勒信仰内容

弥勒是梵文 Maitreya 的音译，意译是慈氏。在佛教经籍中，弥勒之名早见于巴利文经典，汉译大乘佛典中，以弥勒为主题内容的佛经，亦不下二三十种，也有密教类弥勒经籍。这些弥勒经典，一部分已失传，也有很多同本异译的。^①一些早期佛教史话同样载有弥勒的故事，这些传说可能比小乘大乘的经典出现

得更早。弥勒经典中，弥勒所扮演的角色有三：

（一）弥勒是婆罗门子，与波婆梨有师弟关系

《贤愚经·波婆离品》述波婆梨派弥勒等十六弟子往释迦处问难，并载佛姨母织金袈裟、穿珠师等故事。香川孝雄指出这些早期佛教史话、传说，很可能代表弥勒思想的最早形态。^②秣菟罗、犍陀罗地区的弥勒造像，都有束发髻、长发垂肩、手持水瓶的婆罗门特征，^③因此婆罗门弥勒在佛教的出现，很可能反映当时印度教与佛教交涉而产生的，不一定如一般所说源自波斯宗教的密特拉神。^④

（二）弥勒是菩萨

弥勒是小乘经典仅见的二位菩萨之一，《增一阿含经》卷11、19均称弥勒为菩萨，同经卷44亦谓弥勒菩萨在兜率天。菩萨见于小乘经典，菩萨思想其实在小乘时期已经萌芽，而弥勒菩萨的出现亦意味着由小乘到大乘、阿罗汉到菩萨观念的过渡。因此，除释迦之外，弥勒菩萨比大乘诸佛、菩萨的信仰流行为早。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代表弥勒菩萨思想发展至最后的阶段，经中述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修行、说法的情形及兜率天的种种庄严，并谓积集观兜率天、念弥勒佛名的善果，可往生兜率陀天及来世值遇弥勒。

（三）弥勒是将来佛

继释迦将来成佛是弥勒信仰的另一中心思想。在《阿含经》中，释迦预言弥勒是将来佛，或是弥勒发愿作将来佛，由释迦授记。将来佛的思想，可能与印度人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观念有关，因而佛教产生多佛说，过去有佛、现在有佛、将来亦有佛，甚至是贤劫千佛。此外，又有三世佛、七世佛及配合方位的四方佛、十方诸佛等说法，在这些题材中，主掌兜率陀天的未来佛弥勒担当了一定的角色。

佛经载弥勒下生阎浮提时，正当转轮王治世，是时人寿延增至八万四千岁（或说八万岁），女人五百岁才出嫁，国家富盛，人民衣食丰足，无贪著苦恼，只有饮食、衰老等疾病。转轮王有七宝、千子，治国不用兵；他献七宝台与弥勒，为婆罗门所破坏，弥勒遂悟无常之道，出家成正觉，于龙华树下三会广度众生。以上情节《增一阿含经》卷44已经完载，《长阿含经》卷6《转轮圣王修行经》则偏重描绘转轮王国，而大乘的《弥勒大成佛经》、《弥勒下生经》基本上继承《增一阿含经》卷44的内容，加上弥勒净土庄严的描述，很可能是受到西方净土思想影响而发展出的新内容。^⑤

以上三个角色中，中国的弥勒信仰以后二者为主，弥勒菩萨及弥勒佛分别代表“上生”及“下生”两方面的思想（上生指上生兜率天，值遇弥勒；下生指随弥勒下生转轮王国龙华闻法）。弥勒作波婆梨弟子往释迦处问难故事与新疆一带出土吐火罗文A及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剧本相同，说明该故事在中亚地区流传在9、10、11世纪，^⑥但中原这方面的内容并不明显，或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中国的弥勒信仰

（一）弥勒菩萨信仰与禅

中国的早期弥勒信仰以弥勒菩萨为中心，并与禅宗的传播及北朝禅法的流行有密切关系。

兜率天是梵文 Tusita 的音译，意译“妙足”、“知足”，是六欲天之一，分内、外两院，外院是欲界天之一部分，内院是弥勒居于欲界的净土。《上生经》说欲生兜率天者要观兜率陀天及念弥勒佛名：

欲为弥勒作弟子者，当作是观。作是观者应持五戒八斋具足戒，身心精进，不求断结，修十善法，一一思惟兜率天上妙快乐。作是观者，名为正观。^⑦应当系念，念佛形象，称弥勒名。^⑧

观弥勒兜率陀天，是禅观的一种，意谓入定中可见诸佛国土；念佛也是禅法之一，是净土教之依据^⑨。

中亚的罽宾及于阗都是流行小乘禅学的古老佛国，法显及玄奘游历西域，都记载了当地弥勒信仰与禅结合的资料。法显(377—442年)在罽宾北的陀历国见过一木刻弥勒像，^⑩约二百年后有传说。^⑪玄奘到于阗附近的牛角山，有如下记载：

牛角山岩有大石室，中有阿罗汉入灭心定，待慈氏佛，数百季间供养无替。^⑫

阿罗汉以神力升天见弥勒，或是入定待弥勒将来下世，都是僧人参禅的写照。

道安(314—385年)是最早信奉弥勒的名僧，^⑬《高僧传》载：

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⑭同书记苻坚送给他外国带回来的弥勒像，这是文献记载中国最早见到的弥勒像资料之一。

苻坚遣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每讲会法辄罗列专像。^⑮

道安写的《婆须蜜集序》谓：

集斯经已，入三昧定，如弹指顷，神升兜率。……兹四大士，集乎一堂，对扬权智，贤圣默然。^⑯

道安时《上生经》虽未译出，但他编的经目已载录有几本弥勒经典，他也是习禅的，藉入定升兜率会见弥勒，可见早期弥勒信仰

与禅的关系。

《高僧传》卷3记载河西凉州僧人智严(4—5世纪)到闾宾习禅法,其后在中土弘扬禅学,晚年因感未出家时有所亏犯,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于是重归天竺,得一罗汉指点,“乃为严入定,往兜率谒弥勒,弥勒答云得戒”,智严大喜,步归至闾宾而终。^{①7}这些记载说明早期僧人有习禅求弥勒决疑的信仰。

十六国时期河西佛教中心的北凉(401—439年)极为流行禅法,沮渠蒙逊一族在甘肃一带大量开窟造像及兴建寺院,现存武威天梯山石窟、玉门昌马石窟、马蹄寺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等遗迹,都有十六国时期造像风格;敦煌268、272、275等一批石窟,很可能是西凉、北凉时期所建造,^{①8}其中弥勒是极为流行的尊像之一,也是禅修信仰的主要内容。^{①9}酒泉、敦煌地区亦出土过几座北凉时期的造像石塔,其中马德惠造像塔刻有交脚弥勒菩萨与过去七佛的题材,^{②0}一再证实河西是早期弥勒信仰的中心地。因此《上生经》由北凉的沮渠京声译出绝非偶然。北魏灭凉(439年),京声南奔于宋,安国侯则逃往高昌立国,于445年造一弥勒像,建寺供奉,至今还存有碑文载录。^{②1}

华北地区5世纪前后开创的石窟,亦大都与禅僧有关。如敦煌莫高窟在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由沙门乐傅、法良禅师所创;炳灵寺169窟西秦建弘元年(428年)的供养人题记有墨书:“□大禅师昙无毗之像”;麦积山是凉土禅师玄高率徒修禅的地方;云冈五窟是由来自凉土的禅师昙曜开建。此等与禅修内容有关的石窟在北魏时期最为兴盛,一直至隋,弥勒均是流行的尊像之一,北地禅法流行与石窟开凿及弥勒信仰的关系可参考刘慧达、贺世哲的讨论。^{②2}

(二) 弥勒佛信仰

中国的弥勒佛信仰往往与政治结合,或是在位者借重弥勒以

巩固政权，或是民众藉弥勒下生之名“起而作乱”，构成很特殊的社会现象。

将来佛弥勒的信仰，北魏时已为帝王所接受，《魏书·释老志》载：

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将来有弥勒佛，将继释迦而降生。

北魏文成帝（452—465年）复法后，奉佛教为国教，强调佛统来巩固国统，说明元魏源远流长，自有根基，并宣扬皇帝就是当今如来。因此释迦、弥勒是北魏极为流行的尊像，造像数量最多。北魏时弥勒下生的思想影响，同时可见于多次沙门起事的例子。由于《下生经》说将来佛弥勒下生阎浮提时，正是贤王治世、国盛民丰的理想国土，因此民众间一些团体便藉弥勒下生之名，自称弥勒佛出世，起而谋变，或表现其对现世政治、社会状况之不满，并往往渗入妖妄之谣讖，迷惑信众，这些起乱事件，世称之为“弥勒教匪”。《魏书》记载的佛教匪乱，不下十次，河北一带最为频繁，其中肃宗延昌四年（515年）沙门法庆之乱便是藉弥勒下生之名聚众叛乱最早的例子，他鼓吹“新佛出世，除去旧魔”而杀县令、僧尼，毁灭寺院、经像。隋代白衣持香花一团及宋子贤、向海明事件等，都是自称弥勒佛出世而起事。²³

唐代武后则天为了建立其政治权力及篡夺皇位，同样自称是弥勒佛下生，由薛怀义等人造《大云经疏》，建立女身为国王的理论根据，又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²⁴武氏自号“金轮”，又敕令在诸州建造大云寺，藏《大云经》；她倚重弥勒下生说，直接影响当时的弥勒造像，如龙门惠简洞的弥勒佛大像、敦煌延载二年（695年）96窟的北大像，都是武则天时期所建造。

由唐至宋，尚有多次民众以弥勒之名谋变事例，宋元之后的白莲教，又与弥勒信仰有关。²⁵这些反乱或政变事件虽各有其社

会背景，但都是利用宗教作手段，以达到政治与社会之目的，而弥勒下生说则为这种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和依据。

三、早期佛教美术的弥勒题材

弥勒造像最早出现于公元2至4世纪印度北部秣菟罗及西北犍陀罗的美术中心地，弥勒身披瓔珞、天衣，戴项饰、臂钏或冠饰等，作菩萨打扮；造像特征是长卷发垂肩、头上结髻及左手持瓶，也有在发髻或头冠上饰小型的窠堵波。弥勒菩萨的发型及持瓶两特征与婆罗门教的梵天相同。圆雕的弥勒菩萨像有立像和坐像，以立像为主。最早一件有“弥勒”铭记的造像来自秣菟罗地区，约2世纪中期，但发型是螺发不是垂肩的卷发。^{②6}在中亚阿富汗东南部一带发现的弥勒像，出现了交脚式，估计这是模仿当时阿富汗皇族的坐相，^{②7}此坐式成了辨认弥勒的另一特征，经由中亚一带传入敦煌及华北。圆雕造像以外，弥勒亦常在浮雕石刻中出现，并常与释迦、过去七佛及锭光佛授记等题材组合，强调弥勒菩萨是继过去七佛及现世释迦佛而将来成佛的角色。

新疆南北二道佛教中心都有弥勒造像、壁画的遗迹。如北道高昌出土过5世纪北凉风格的造像石塔，又有弥勒像、佛寺的碑记。另发现有9至10世纪回鹘统治高昌时期的弥勒绣像；^{②8}焉耆也出土过6至7世纪彩绘的交脚弥勒菩萨木像。^{②9}南道于阗附近巴拉维斯遗址壁画有6至7世纪的倚坐弥勒佛像，与北道流行的交脚弥勒菩萨像相异，反映于阗一带大乘佛教的流行。^{③0}此外，犍陀罗美术中心贝格兰以西的遗址如巴米羊、方都基斯坦都有弥勒题材的造像和绘画，这些都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特殊风格与形式，并说明弥勒信仰在中亚、新疆一带极为流行。

弥勒信仰传至中国而大盛，早期华北石窟寺的弥勒造像，交

脚弥勒菩萨为最流行的形式。南北两地的金铜、石刻造像有立式、坐式的弥勒佛和菩萨像，立像较为流行。又由一尊像发展至三尊、五尊、七尊像等较复杂的形式；一部分半跏思维菩萨像，也有铭记为弥勒菩萨。^{③①}各种弥勒像出现及流行的时间稍有异，但以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中叶最盛，其中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后，踏入龙门期造像数量最多，甚至压倒释迦，成为当时信仰的主流。534年北魏灭亡后，弥勒造像衰落，由新兴的观音、无量寿佛、阿弥陀净土信仰取代。^{③②}6世纪后半，弥勒造像又变化，出现倚坐菩萨、倚坐佛的新形式，一直流行至隋唐，此后形式固定。

个别造像以外，与弥勒经常一起出现的相关题材有释迦、三世佛、七世佛及释迦多宝佛。弥勒与释迦一起出现，强调弥勒菩萨将继续释迦成佛，如龙门古阳洞的左右大壁都在上层佛龕雕释迦坐佛，下层造交脚弥勒菩萨像。三世佛及七世佛同样强调弥勒将来成佛。造三身像表现过去佛迦叶、现在佛释迦及未来佛弥勒，有云冈昙曜5窟及5、13等窟，龙门宾阳中洞、魏字洞，以及巩县、炳灵寺、麦积山、万佛堂等石窟。^{③③}七世佛则通常在佛龕顶或造像的背光罗列，在云冈11窟上层是弥勒龕一铺五尊，下层便是过去七佛立像。这些题材的重复出现，反映弥勒下生及将来佛信仰的流行。释迦多宝佛并坐像则表示《法华经·见宝塔品》的场面。《法华经》终为千佛授手，可“往生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北朝《法华经》的流行亦有助于弥勒信仰的传播。^{③④}

造巨大的弥勒尊像，是弥勒崇拜的另一特色，由法显、玄奘记载陀历国所见的巨型木刻弥勒像开始，建立了中亚及中土造弥勒大像的传统。如北魏云冈17、13窟已有巨型的弥勒像。南朝萧齐僧护在判县石城山造弥勒大像；^{③⑤}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定州正解寺（后称开元寺）造弥勒大像；^{③⑥}隋道积又在蒲州普救

寺造百尺弥勒像。^{②7}此外，唐龙门武则天时期造惠简洞大像，大万五佛洞及摩崖三佛龕主尊，莫高窟 96、130 窟的大像等，都是巨型弥勒像的例子。

6 世纪东西魏、北齐、北周时期佛教受到新的外来影响，信仰内容产生重要变化，美术方面出现了复杂、多样化的题材，如四方佛、十方佛、密宗造像等。^{②8}新的信仰内容，弥勒以新的姿态出现，一方面继续扮演未来佛的角色，如定光、释迦、弥勒三佛的造像依然流行；另一方面在新的四方佛题材又占一席位。四方佛的出现与图像鉴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与四方佛净土、诸佛净土的发展密切关联，在这些题材中，弥勒通常以北方或东方净土主的身份出现。

四、《弥勒变》的源流

《弥勒变》基本上亦是净土信仰发展的产物，所描绘弥勒菩萨的居所兜率天是为天上乐土，弥勒下生阎浮提时的理想国土为人间净土。莫高窟现存最早的隋代《弥勒变》，都只限于描绘《上生经》的内容。宫殿式建筑代表兜率天宫，弥勒菩萨在内说法，天人眷属等代表信众死后往生兜率天净土。在早期佛教美术中，除上述各题材之外，表现弥勒在兜率天宫的内容是屡见不鲜的，这些都可视为《弥勒上生经》的前身。

犍陀罗美术有一组弥勒浮雕图，通常位于佛像、石碑的台座或顶部，正中是持瓶、立式或交脚的弥勒菩萨，两旁有手持棕榈叶，穿贵霜式服装的供养人，这类浮雕在今阿富汗境内贝格兰附近的疏特落遗址出土最多，一部分只很简单地排列弥勒及供养人，另一类较为复杂，或增加建筑题材。

图版 1 是一立佛像残余的台座，中央是一建筑物，由卷叶纹

柱头支撑一印度寺院常见的支提式尖拱门，门内华盖下是一交脚菩萨，卷发垂肩、结髻。由其发型及交脚坐式可辨认是弥勒菩萨。菩萨双手交置胸前，是早期说法印的一种。拱门外分上下两列共八身供养人，或手持供物，或双手合十面向弥勒；左右两旁树下各有一身较大的守护神像。台座上段在柱身相隔之间共十身不同姿态俯视的人物，人物整体构图以拱门内的弥勒菩萨为中心。另一例（图版2）梯形屋顶代替支提式尖拱门，两旁分上下两层，上层共四身供养人，下层左右各一身游戏坐菩萨，两端是守护神。所表现的内容，罗辛腓德指出是弥勒在兜率天宫说法。^⑳这两个台座的浮雕图约相当3世纪前期，属疏特落遗物图像仪轨。腓德同时指出净土、天国的观念在印度先佛教时期思想已经有悠久历史，早期印度美术亦不乏天国的题材，如山奇窣堵婆1号便有欲界天、忉利天的表现；兜率天同是六欲天之一，也是早期印度美术流行的题材，因此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说法图的出现，代表早期佛教美术天国题材的进一步发展。阿弥陀、无量寿佛的概念，大致亦在贵霜时期形成，其后净土思想发展极至是东亚大乘佛教美术的大型净土变相图。^㉑因此犍陀罗美术所见的弥勒菩萨在天宫说法图浮雕不单是《弥勒上生变》的雏型，也是大乘净土变的前身。

图版3石碑上部的半圆浮雕，虽没有前图代表兜率天宫的建筑题材，但内容相同。弥勒菩萨的特征相同，十身听众也是分上下二层，但人物造型较为丰满，自然，特别是听众姿态活泼，有倾身，有后仰，表现聆听弥勒说法时的不同姿态。柏林美术馆藏一弥勒造像台座浮雕，据称来自察尔沙达遗址，东京个人藏一例，弥勒位于锭光佛本生浮雕图的上部，塔斯拿博物馆也藏有结跏趺坐弥勒菩萨在天宫的浮雕图。^㉒

犍陀罗的弥勒菩萨浮雕图，与新疆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

窟壁画的弥勒菩萨天宫说法图极为接近。克孜尔石窟 17、18、80、110 及摩耶窟（图版 4），库木吐拉 14 窟都有弥勒菩萨天宫说法图，通常位于石窟门上方的半圆形壁面（因窟顶呈拱形）。构图是一手持瓶一手上扬或双手作说法印的交脚弥勒菩萨位于中央，左右围绕 10—12 身听众，分前后二列而坐，与图版 3 构图如出一辙。画面上段通常画一列栏杆及拱门，代表天宫栏墙建筑（莫高窟北朝至隋亦流行在壁画上层画天宫栏墙与天人）。17 窟的壁画最早，碳 14 年代相当于 310±80，38 窟碳 14 年代约 465±65，^④摩耶窟的年代则可能晚至 7 世纪前半，^⑤听众的造型自由活泼，层铁盘丝线条有力而稳定，凹凸的晕染法及强烈的色彩对比，都代表了新疆石窟壁画的特征。

5 世纪中叶至 6 世纪中叶，阙形或屋形龕交脚弥勒像是中国早期弥勒菩萨天宫说法图的例子。敦煌，最早北凉至北魏的一批石窟，如 275、259、254、251、257、260、437、435、431、246 等窟，都有交脚弥勒菩萨造像。除了 275 窟作为主尊外，弥勒菩萨像常置于南北壁面的上层龕，或中心柱南北向的上层龕内。龕式一律是独特的汉阙形龕，如图版 5。弥勒菩萨头戴宝冠，宝冠上常饰有禅定化佛，上身半裸，腰束羊肠裙，项饰璎珞，身披天衣，双脚足踝部相交。犍陀罗式弥勒菩萨像的婆罗门发型及持瓶两个特征在传入中土的过程已经消失，新疆石窟则还见有持瓶的弥勒像，菩萨双手通常在胸前交叠，或拇指与食指、中指或无名指相捻作说法印（或称论辩印），或是右手上扬、左手手心向上平放在膝作施无畏、与愿印。造像是泥塑，头光、背光、靠背则描绘。汉阙形龕由母阙及子阙组成，主阙高耸，两侧子阙低下，阙身间架屋檐，屋顶瓦棱泥塑，其余柱身、斗拱、木椽等描绘。阙是宫殿、陵墓前分立的成对建筑物，流行自周至汉，现在最早的形象见于长沙马王堆西汉 1 号墓帛画，左右并立

两柱，各具台基，“中央阙然为道”，象征天宫的大门，^④因此阙形龕无疑就是代表弥勒菩萨的居所兜率天宫。汉阙龕是弥勒像独有的龕式，位于壁画或中心柱的上层，表示天宫高踞天上，龕内弥勒菩萨说法，龕内外画有胁侍菩萨，或天人擎花枝、雨花香供养弥勒，俨然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说法的情景，与后出的《弥勒上生经变》一脉相承。

云冈继昙曜5窟后建的7、8、9、10窟受西域风格影响最浓厚。7、8窟的交脚弥勒菩萨像通常放置于楣拱龕内（图版6）。楣拱龕上部呈梯形，通常为小矮人承托。梯形的龕顶由犍陀罗、阿富汗一带流行的建筑类型演变过来；^⑤卷叶纹柱头很明显是犍陀罗地区受希腊—罗马艺术影响的产物；托柱的小鬼也是早期印度、犍陀罗美术所常见。尽管楣拱龕、分层的柱身都是原来建筑题材的变形，将弥勒像放置在这种龕内可能还保留有原来弥勒在天宫说法的概念。比7、8窟建造稍晚的9、10窟则出现了汉化现象。外来柱式的保留，楣拱龕顶由中国楼阁式屋顶取代，有斗拱的结构，瓦脊的屋顶，鸱尾及三角形、鸟形等装饰，屋檐下分三间大殿，弥勒菩萨居中，左右是胁侍菩萨及飞天。12窟前室东西壁上层的弥勒龕（图版7）是由楣拱龕发展至屋形龕，进一步汉化，由梁、柱、斗拱、瓦顶组成的建筑物，已完全是中国木构建筑的类型，继承汉魏以来宫殿建筑的形制。

无论是支提式建筑或是阙形龕、楣拱龕、屋形龕，宫殿建筑题材与弥勒一起出现，具有象征弥勒菩萨居所兜率天宫的意思，证明由印度西北犍陀罗地区，以至新疆及华北等地的早期佛教美术中都有弥勒菩萨在天宫说法的题材，其后的《弥勒上生经变》便由此发展出来。

五、《弥勒变》形成的年代

中国的弥勒造像在 5 世纪中叶至 6 世纪 30 年代左右最流行，特别是华北地区。当时造像发愿文所表现的信仰内容，无非是为追求现世得福、死后生天及龙华闻法。继“兜率往生”说之后，昙鸾著《往生论注》及弘扬“乘佛愿力”。无量寿佛及其西方净土信仰亦在 6 世纪初形成，但当时信徒不辨兜率天与西方净土。造像铭文记载造弥勒像而愿生西方妙乐国土，造无量寿佛像而发愿“弥勒三唱，恒登先首”，造释迦像而希望往生西方净土值遇弥勒等，这些说明净土信仰形成初期，兜率天与西方净土混淆不清，以后唐代才发展出严格的《弥勒变》。

6 世纪中，佛教美术在内容及风格上出现变化，造像记出现造“天宫”或“弥勒下生像”的新标题，很可能与《弥勒变》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现将有关资料检录如后：

- 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李氏合邑造像碑记“造天宫浮图四区”（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第 260 页）
- 东魏武定三年（545年）朱永隆等七十人造“天宫乙区”（同上第 268 页）
- 东魏武定年间意瑗法义造“佛国之碑”（同上第 280 页，图 570）
- 东魏武定四年（546年）怀州栖霞寺比丘道颖、僧云等“造砖天宫一区”（同上第 283 页）
- 北齐天保三年（552年）张世宝合邑州余人“敬造砖天宫一区”（同上第 316 页）
- 北齐河清四年（565年）朱昙思等造塔记载“刻摹兜率”（《金石萃编》第 33 卷）

——北齐天统三年（567年）宋灵造像碑记“敬造天宫石像各一区”（《金石萃编》第34卷，大村西崖第338~339页）

——隋开皇四年（584年）任洪乱合邑七十余人“敬造天宫一区”（大村西崖第394~395页，据罗振玉拓本）

造天宫像、佛国碑是东魏开始，齐、隋间流行的一种题材，北魏的造像铭文已表现有“愿生兜率”、“往生西方妙乐国土”或是“生于天上诸佛之所”的思想，但当时的造像主要表现对尊像的崇拜，“天宫”、“佛国”等标题的出现，反映信仰的重心已由尊像转移至天上诸佛的国土，因而出现描绘佛国，阿弥陀净土信仰已逐渐普遍，净土美术亦迅速发展，如麦积山西魏127窟、北齐南响堂山第2窟便有现存最早的《阿弥陀净土变》资料，^[6]因此在西方净土信仰及其美术发展的影响下，形成用雕塑或绘画等造型艺术描绘弥勒兜率净土的概念是完全可能的。

兜率天原属于欲界六欲天之一，而净土、佛国则是相对世间的土、国而言。因此弥勒的兜率天与阿弥陀的净土原意是有区别的，但弥勒信仰发展至与净土宗合流，如“弥勒三经”都已属净土类经典，并且佛教成为一种民间宗教，兜率天宫对信徒来说都代表死后往生的极乐国土。造兜率天宫的标题出现以前，弥勒菩萨在天宫说法这个题材在早期美术中已流行，由此发展出大乘净土的《弥勒上生变》是顺理成章的演变过程，因此6世纪中叶的东西魏、北齐、北周可视为《弥勒变》的形成滥觞时期。6世纪末，踏入隋代，《弥勒变》产生，不单有文字载录，并有实迹见于敦煌。

造弥勒下生像，是北齐出现的新题材，载录资料包括有：

——北齐武平二年（571年）石方僖、董相胜、董通达三人造弥勒下生像（大村西崖第344页，图635）

——北齐武平五年（574年）董嵩云、赵苟儿等造弥勒下生像